

白烟亭

孙颀

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纪

上海文艺出版社

知识分子的
一个世纪

雪
庐
烟
尘
门
槛

孙 颔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庐·烟尘·门槛: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纪/孙颙.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5321-2683-8

I.雪… II.孙…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098 号

责任编辑:韩 樱

装帧设计:袁银昌

插图设计:王志伟

雪庐·烟尘·门槛

——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纪

孙 颙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e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511,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100 册

ISBN 7-5321-2683-8/I·2089 定价:3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886520

自
序
…
在高高的书架下
…
孙
颀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写了三部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背景当然是我从小生活其中的上海。

人生是一次远航。起锚时的林林总总,那岸上的斑驳,那港湾的纷杂,深深烙进他的心底。当他在漫无边际的海上漂浮,从心底荡起的思绪便来慰劳他的寂寞;当他在翻腾咆哮的浪谷间争斗,从心底迸发的潜力便来支撑他的肌骨。

我的文化意识的萌动,好像是在南昌路两排高高的书架下。那是幢临街的小楼,底层的客厅,大约四十平方米不到,高却达三米。外公是读了一辈子书的文人,后半生供职文史馆,藏书甚丰。客厅南、北两面是门与窗,东、西两堵整墙便悉数为高高的书架堵塞;墙角落,重重叠叠垒着漆得乌黑的书箱,据大人说,那是藏史籍的。

小时候,过暑假,父母恩准,让我去外公家打扰几天。年少的小舅舅,比我大不了几岁,不讲辈分,舅甥俩十分亲密,夜间便在客厅地上铺席而睡,那两堵书架便愈发高大,在黑暗中如悬崖峭壁耸立在我身旁,令我敬畏。我不明白,外公何以能读那么多的书。那时候,我还不懂“知识海洋”这样的词儿,在感觉上却完全接受了它。大人给几角零用钱,去街上小书摊租来《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连环画,待夜风将酷热一点点收去,我和小舅舅睡在草席上,于天井蟋蟀的鸣唱中,一页页翻过去,竟还生出妄想:总有一天,我也能把那书架

里厚本儿读尽了。

后来,或许是老人觉得孺子可教,或许是外公偏爱外孙,老先生给我讲过古文与诗词格律,点拨过围棋要理,并将他用蝇头小楷写成的围棋图谱手稿送给我。可惜,上山下乡之前,我将那手稿搁哪儿了。现在已找不见。

我在人生的路上走得远远的,有时,觉得那两排高高的书架已遥不可及,恍若一梦。在乡下点着小油灯啃干馒头,在海滩上赤脚挑担踩淤泥,我的眼前曾不时闪过那书架长长的影子。我想,我怕没法走到它面前了。上海的家人在信中说,那客厅被街道生产组占了,书架已被剖开做了长桌板凳。再接下去,一向开朗的外公也患病而逝。难道中国就不需要读书人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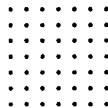
然而,化为桌凳的书架的魂儿,却落在我心中散不去。在乡下,只要寻得到书,我仍如饥似渴地读。那时候,我精神生活的一大乐趣,便是在艰苦的劳动中哼几句五言、七言的小诗,如,犁田回归,哼出“夕阳西下红一线,水牛横跨悠悠还”,不伦不类,不文不白,自得其乐而已,并有怀念外公的感受。至于后来慢慢学写起小说,怕也和始终不肯丢弃对书的爱好有关。

前些年,我将对那两排高高的书架的眷恋之情写进了小说《雪庐》之中。

之后,我又写了《烟尘》和《门槛》。三部小说,都以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主线,前后的时间跨度为一世纪。现在合成一册,或许能提供一份上海百年生活的读本。

2004年11月

雪
▤
庐



为了从长辈们的故事里走出来,我决定动手写长辈们的故事。

一、庚子年，老太爷闯上海滩之谜

“雪庐”老太爷林金洋的来历，有点儿难以捉摸，即使在他归天半个多世纪之后，还是个猜不透的谜。几十年的老街坊，掉了牙的老头、老太们，大热天时睡不着，摇把扇子月光下聊到半夜，你摆你的龙门阵，他说他的老故事，谁也不服谁，谁也说不清。老被人这般念叨，林老太爷在土里也不会安稳，该不停地打喷嚏。

林金洋是庚子年到上海的。中国传统的年份叫法，别说洋人听了稀里糊涂，现时的中国人要弄通弄懂也怪累的。按天干地支编出的年号，近代比较出名的、连外国人也知道的，好像有三个：一是戊戌年，康有为、梁启超鼓动那位倒霉的光绪皇帝变法；一是辛亥年，孙中山领着国人把拖辫子的皇帝赶下了台；另一个，就是庚子年了，位置在戊戌年与辛亥年之间，公历应是1900年，究竟算19世纪的末一年，还是算20世纪的头一年，都可以，随便吧。庚子年，中国闹了义和团，八国联军来打砸抢，以此为背景的电影，中国、外国都拍了，赚钱不少，观众当然也不少，庚子年自然很出名。

林金洋到上海时，正当壮年，约莫40岁，带着不到10岁的长子和才几个月的次子，没有夫人陪伴，却跟着位顶多20岁的乡下姑娘——像是佣人，因为抱孩子、洗尿布、买菜烧饭，都归她管。据老一辈传说，那时的林金洋很狼狈，随便寻了座旧平房便住下了，看不出有多少行李、财物；大部分时间躲在屋里，既不出去寻事情做，也没啥亲戚、朋友来往。大约因为太胖，林金洋的脸呈圆形，下巴又厚又大，笑脸常开，跟邻居的关系处得很好，只是不爱串门子，不爱多说话，让人觉得有点儿神秘。从口音听出，他是湖南人。有人说，湖南山区土匪多，别是抢了财物到上海避风头的脚色？这说法流传不开，因为很难把这善模善样的人和土匪联系起来，看他杀鸡都不敢，还能杀人放

火？另有两种故事，倒让人将信将疑：一个故事说，林金洋是某钱庄或某绸缎庄的伙计，为了女人（当然是指那个20岁的乡下姑娘）捞一笔主人的钱逃到上海。这故事的破绽是：长子从何而来？那乡下姑娘显然生不出如此大的儿子，林金洋应该另有夫人。富有想象力的人儿说，林金洋既是伙计，又是女婿，因为老婆太丑，耐不住，便偷了钱，带了意中人逃走。这么编法，聊天时虽可勉强混过，细细一想，还是不近情理：既然情人私奔，应该轻装，何苦把两个儿子都拖着走？还有一个故事，内容平淡些，听上去倒像回事，说林金洋本是乡下土财主，和人结了仇，对方势力大，斗不过，连老婆都被杀了，只得带着儿子、丫头逃到上海避难。这故事有头有尾，有板有眼，缺陷是过于简单了，不够刺激，听众不过瘾，所以讲的人也不多。

林金洋安分了一年，很快又成为邻居注意的中心。他竟然在附近买下一块地，开始建造法国式的小洋房。这一带是法租界，搞法式建筑本不稀奇。然而，林金洋到底靠什么发家呢？于是，关于他的神秘的来历，又多了几种版本。反正中国人有的是时间，在口头文学的创作上，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二、“文革”中，“雪庐”杀来了红卫兵

这楼不大。底层是一间大会客厅、一间储藏室和一间厨房。二楼是两间正房加一套卫生设备。三楼，虽然也有两间房，但位处尖顶之下，又矮又不规则，被上海人称作“假三层”，窗子也小，不舒服，常常分配给佣人去住。林家没有佣人，那跟着来的乡下姑娘，在房子建造好以后，糊里糊涂就升为林太太了，虽然没有大肆声张，但几年后她为林金洋生下一位千金，名分也就确定无疑了。

乔迁是在那年春节前夕。刚好下过一场雪，新楼的红瓦上蒙了一层晶莹的雪；客厅前的小院里，正中的一棵松树和东墙根的几株竹子，都染成了银白色，煞是好看。

林金洋略一沉思，挥毫草书两个大大的字“雪庐”，吩咐木匠去

凿块匾挂上,并笑呵呵地向前来祝贺的邻居解释说:“瑞雪兆丰年,瑞雪兆丰年哪!”这一说,倒有点儿像乡下的财主了。

林金洋死后40年,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冲进了“雪庐”。林金洋那张胖胖的脸正躲在一个大大的黑木框里,悬在客厅上方,笑嘻嘻地欢迎不请自来的客人。可惜,具有高度革命警惕的小将们,并未被他菩萨般的笑脸软化,架起两只方凳把黑木框扯下来,扔在地板上,大头皮鞋踩上去,玻璃哗啦啦踩碎了。

红卫兵们来之前经过战斗动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围绕“雪庐”的主人那么多传闻,抄家抄出杀人用的长刀短枪,不足为怪;兴许还能发现间密室,“芝麻开门”,找到成箱的金银财宝。红卫兵把林家老小统统赶到三楼的小屋内,喝令他们老实交代,然后在“雪庐”内彻底翻查起来。那些日子,关于红卫兵抄家的赫赫战功传得神乎其神,张家抄出特务联络用的电台,李家抄出变天账和炸药;某某资本家家里发现了一座水晶宫,某某名人寓所查到一只纯金的八仙桌……扫荡“雪庐”的红卫兵,渴望着能爆炸一颗震动上海的原子弹,篦头发似的把“雪庐”细细搜了一遍,乃至撬开了底层客厅的地板,砸坏了院子松树下的水缸。他们很失望。称得上武器的,只有一把勉强裁得开纸的半尺长的铜刀。这群红卫兵,是上海名牌中学的高中生,有点儿知识,晓得这铜刀是清末有地位的人的玩物,当“四旧”扫掉完全够格,若说它是土匪的武器则近乎开玩笑。金银财宝,有是有一些,但少得可怜,加在一起也值不了两千元钱。红卫兵们不想如此收兵,商量后,决定审问。他们把林家的家长——林金洋的长子林若希带进了二楼正房。

林金洋死后10来年,那个跟随他一起到上海、后来又成为他太太的女人也死了。他身后共有3个子女,长子林若希,次子林若白,小女林若清。次子林若白,在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很出过点风头,算一个知名人物,1927年,风云突变,林若白从血泊中逃出,流亡日本,从此不知下落。老太爷林金洋也就死在1927年。那年,他顶多67岁,死得早了些。据说,他最喜欢的是次子林若白,听到若白危难,心中一

急,得脑溢血归了天。小女林若清,聪慧秀美,远近闻名的,抗战期间,在上海死于汪伪特务之手,死得很惨。她母亲——跟林金洋到上海的乡下姑娘,那时已经50多岁了,听到女儿的噩耗,哭昏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夫妇俩都为子女而死,也是“心有灵犀”了。以后几十年,在“雪庐”中居住的,主要就是长子林若希这一房的人了。

林若希在长相和性格上,甚得父亲真传,也是胖胖的发福样,也是宽宽厚厚的下巴,也是整日里笑脸常在。街坊们说,他的脾气比林金洋还随和,几十年没听他高声嚷过一次。大暑天,人人热得冒汗走油,他脑门上不见一颗儿汗珠,也爱坐藤椅上摇把芭蕉扇,却像唱戏文的装装样子,摇一下,扇儿360度转一圈,那风儿微弱得连蚊子都赶不走,还笑着对人说:“心静自然凉啦。”

林若希和红卫兵遭遇上,已在“古稀”年之后了。他进二楼正房时,有几个红卫兵着实吓了一跳,若不是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真以为撞见鬼了——刚才他们不是在客厅里摘下林金洋的照片、又狠狠踩上一只脚吗?怎么现在林金洋又钻出碎镜框复活了呢?红卫兵们很快镇静下来,有人在心里骂了一句:“奶奶的,跟他死鬼老子一个模样!”

审问是十分严正的。

“林若希,你这个封建主义的老混蛋,你交代,你一辈子做过多少坏事?”

被红卫兵抢走了扇子,手中没得东西可摇,这么热的天,又处在被审问的境地,林若希银丝般的眉毛上,还是不见汗粒,可见“心静”的功夫很深了。也许上了年纪,中气不足;也许慑于红卫兵权威不敢喧哗,林若希噤着,说得慢悠悠的:“老是老了,也有点混蛋,封建主义却不敢当,我像你们这年龄,就革清朝皇帝的命了!”

林若希像桃花源中人,不知道外面闹得何等天翻地覆,顶撞红卫兵,是要吃皮带铜扣的。算他福气,闯入“雪庐”的这一群,也许因为来自名牌中学,自负有点口才,不爱动武倒爱斗嘴,有人冷笑道:“好个革命!你是什么党?”

“同盟会。”林若希书房中有陈毅手书的“辛亥老人”的条幅,寻

思红卫兵看得到,回答得很泰然。

“同盟会后来变为什么党?”

“国民党。”

“国民党什么时候叛变革命、屠杀人民?”

“1927年……”

红卫兵冷笑着打断他:“你那时在干什么?有没有参加共产党、反对大屠杀?”

“没有……我脱离政界……”林若希感到这些牛犊来者不善,有些儿紧张。

红卫兵讥讽道:“你是国民党的元老啦,功劳大得很哪,怎么又谦虚起来,脱离政界啦?国民党杀共产党,你不站在这一边,就站在那一边,装什么蒜?!”

“……”秀才碰到兵,林若希知道说不清了。

红卫兵又来个刺刀见红:“你不承认是封建主义的老混蛋,怎么后来又当了军阀的幕僚?”

这些都是公开的历史。林若希在“文史资料”中写过不少回忆文章,想必对方看到过,他委婉地解释道:“那是为了倒蒋、反蒋……”

“放屁,狗咬狗的一群混账东西……”红卫兵勃然大怒。

没有林若希分辩的余地了,70多岁的老人,可怜兮兮地站在房中,挨着臭骂,他的脑门上终于沁出了汗珠。

政治训话告一段落,转到经济问题上。红卫兵无论如何不相信林家没有财产,逼他交出东西来。林若希声称自己当文史馆馆员的一点工资,刚够糊口,祖上虽有遗产,多年战乱,早已耗干,现在实是交不出什么东西。一个说有,一个说无,顶出了火星,红卫兵终于克制不住,扬言再不老实,要用鞭子抽了。

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太,急急忙忙从三楼冲下来,冲进了二楼正房,顾不得体面地尖声嚷着:“别打呀,别打呀,他上了年纪受不了,我还有东西,我交,我交!”林若希的妻子曾逸文扑到红卫兵面前,手里高高举着半个金镯子。这金镯子,原来肯定是稀罕物,黄澄澄亮得

很，足金的，一个要有三四两，一对便是七八两了，可惜现在只剩下一截，残缺不全了。林若希希望着自己的老伴，望着老伴手里的那截东西，眼儿发酸了。他猜想曾逸文是抢在红卫兵闯进来之前藏起了那截东西，为家里保住一点值钱的玩意，现在为救他只好拿了出来。

红卫兵端详着半个金镯子，怀疑地问：“应该是一对，其余的藏哪儿啦？说！”

林若希轻轻叹口气：“它的命不好啊！”

“什么话？你这老家伙！”

“人没饭吃，只好一口一口吃它啦。”林若希不愿在相濡以沫的妻子面前过于狼狈，想维持惯常的豁达的风度，把话说得幽默些，结果还是相当苦涩。他走到写字桌前，从已翻得凌乱不堪的抽斗里摸出一小叠收据，“这个就是它的下落啦。”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收购金子的收据。时间大致都在春节之前，每次数量不多，两把，写明是一截金镯子。到这时候，红卫兵们勉强相信了，神秘莫测的“雪庐”，早就一点点空了，它的主人，要靠卖一截金镯子，才能过得了新年。林若希补充说：“这是我妻子的陪嫁物，我没出息，就靠吃它了！”

“老东西，你还敢污蔑社会主义？党和人民每月给你工资，饿着你啦？”

骂归骂，总算不提用鞭子抽了。

三、“辛亥”后，老太爷与若希夜谈的启示

老太爷去世时，林若希以北大教授的身份，正在欧洲游历，没有聆听临终嘱咐，这是林若希终身憾事。林金洋脑溢血，虽然去得快，没多少痛苦，但大儿子赶不回来，二儿子又在逃亡中，老人家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凄凉了。幸亏他不知道一个秘密，否则真要死不瞑目了。他寄托着所有希望的两个儿子，若希与若白，兄弟俩闹僵了，几乎反目为仇。林若希出游欧洲，一半原因在此。那时，北大有个规

定,当教授5年,可以休息一年,照领工资。林若希凭这条规定,请假走了。他没想到,这一去,会永远见不到父亲。

林若希内心深处,埋着与父亲的一次对话。在林金洋死后,那次对话的意味显得越来越深沉。渐渐的,林若希把它当成了父亲的临终嘱咐,只是早说了十几年。

辛亥那一年,林若希从京师大学译学馆毕业,20岁,血气方刚,大志在胸。值此清廷摇摇欲坠、尧舜子孙苏醒之际,林若希很自然地成了北京学运的中坚分子。由于祖籍湖南,与湖南革命党人的关系最为密切。10月下旬,湖南响应武昌起义,建立了督政府。朋友们邀林若希南下,到长沙共商大计,办《湖南公报》,主持革命后的教育事业。林若希举棋不定。那时,北京的形势相当复杂,清皇朝还在作最后挣扎;袁世凯动向不明,一面磨刀霍霍吓唬革命党人,一面和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讨价还价。北京的同学们劝林若希暂不南下,在北京坚持斗争。林若希左右为难,既想去长沙,又在北京的同学们面前说不出口,怕让人觉得怯懦于北方的黑暗。

这时,从上海传来父亲病重的消息,林金洋命令儿子回沪“尽孝”。林若希立即动身,一会儿陆路,一会儿水路,克服战乱期交通上的重重困难,星夜兼程赶回上海。既为父亲的健康焦急,也急于想听听老人的忠告:在这天翻地覆的岁月,他该如何选择道路?他崇拜父亲,知道蛰居上海“雪庐”的老人的价值: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对世事的洞察力超过许多风云人物。林若希本人,就是父亲精心雕琢的产品。“雪庐”内,布置得最气派的是底层的客厅,40平方宽宽大大一间,除去门窗位置,四墙全是由地及顶的书橱,最惹眼的,是那些藏线装古籍的黑木箱。这客厅,实际上是个大书房,老人很少会客,也不准子女随便带朋友进门。他对外人是笑菩萨,对子女却严厉得近于苛刻。客厅内不准放沙发。老人觉得,坐得太舒服了,读书不会刻苦。有几只藤椅,也只在偶尔待客时用用,或在大热天搬到院子里乘凉时坐坐。夏夜纳凉,星光明月之下,院内竹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墙根蟋蟀轻吟低唱,往往是林金洋心情最好、最和蔼可亲的时分。听

父亲说说唐诗宋词,讲讲野史典故,是童年、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林若希赶回上海时,孙中山已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则通电反对。傍晚,林若希一到家,来不及和开门的弟弟若白多说话,三步并两步奔到二楼,见父亲斜躺在床上看报,神态安详,不像病得很重的样子,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便肃手而立,恭恭敬敬给父亲请了个安。

林金洋刚过了50大寿,兴许是太胖了些,脸上的肉有点松弛,再加之是在病中,血色不佳,显得苍老。见儿子归来,他很高兴,关切地问了句:“路上不好走吧?”并指指床头的方凳,示意若希坐下。

“您老的身体怎样?”若希端坐在方凳上,腰板挺得笔直,认真地问。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在严父面前不敢稍稍放肆。站有站样,坐有坐相;“雪庐”内总是静静的,没有大声喧哗,没人开怀大笑;吃饭时绝对不准说话——为这规矩,若希、若白兄弟都遭过罚,说了话,这一顿饭就没得吃了。父子之间互相关怀的温情,也像外交辞令那样表达得简洁、干脆。

“一点风寒,好了。”林金洋淡淡地答。随即将手中的报纸递过来,“你看看,这南北局势如何?”

报上正登着袁世凯的意见:北京专电云袁世凯电伍代表谓国民会议尚未举行民军先设临时政府不能承认。

要是在友人面前,林若希早就拍桌子骂袁世凯是老贼了。在父亲面前,林若希不敢骂。从小,奉父亲之命作文,只要出现激烈言辞,林金洋批上“浮躁,再写”,便算白辛苦一场,搜肠刮肚另写一篇,才能完事。林金洋一再告诫儿子:“利锋尖芒、弩张剑拔,乃行文言语大忌。”这些父训,在北京上大学时会淡忘,一到“雪庐”,便立刻记得清清楚楚,不敢越雷池一步。林若希小心翼翼回答父亲:“民国成立,人心所向,势之所趋,他袁世凯阻挡不住。”

弟弟若白,跟着哥哥上楼,见父兄谈话,不敢擅自闯入,站在门框边,静静地听。那年,他已经10多岁了,和哥哥分开几年,变成个俊气的少年,让林若希看了十分喜欢。他想招呼弟弟进屋,碍着父亲,